



■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刘笑伟：艺术化地抒写人与时代

□本报记者 黄尚恩

黄尚恩：刘老师，您好！祝贺您的诗集《岁月青铜》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这部诗集分为《钢铁集结》《谁能阻止青春的燃烧》《写下太阳般闪亮的诗句》和《一个下午的茶》四辑。您在编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总体考量？

刘笑伟：诗集《岁月青铜》能够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，我一直认为并不仅仅是授予我个人的，而是授予有着悠久历史传统、光荣使命任务的军旅诗人的。毕竟，从第五届鲁奖之后，已经连续12年没有军旅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了。这次获奖，让军旅诗人的光荣得以延续。

说到这部诗集的编排，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亮点的。第一辑《钢铁集结》主要讲述的是当下中国军队生活的一些重要场面，记录和讴歌的是新时代的强军事业。比如《你张开双臂》热情讴歌新时代爱国戍边英雄群体，《快于光》讲述的是中国空军“金头盔”竞赛背后的热血拼搏和战斗故事，《朱日和的“狼”》描述的是红蓝对抗演习中的“蓝军司令”满广志钻研高科技战争的精神意志，等等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《钢铁集结》是我对新时代中国军队“体制一新、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、面貌一新”的近距离观察和诗意化抒写。第二辑《谁能阻止青春的燃烧》主要写的是我30多年的军旅生活。比如，前三篇《火焰》《刀锋》《花海》，就是对我1997年7月1日作为首批驻香港部队的一员，冒着滂沱大雨进驻香港时的深沉追忆。在这一辑里，我写了入伍的场面、老连队、军装、军被、军姿、齐步走和拉歌等军旅生活的生动回忆和细节体验。《红海》写了中国军人在海外执行护航任务，《移防之夜》写了军改中部队移防的场景。其中一些是过去的军旅诗没有写过的题材。第三辑《写下太阳般闪亮的诗句》也是比较新的题材，那就是高科技。这一辑中的诗作，是我对于军旅诗新题材的一些积极探索，主要描绘了近年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高科技成果，比如《巨浪》《东风》《极度深潜》等。第四辑《一个下午的茶》则侧重于表达我的诗歌观点，以及对于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理解感悟。可以说，这部诗集中的77首诗作，都是散发着新时代光泽的军旅诗，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。

黄尚恩：诗集《岁月青铜》的首篇诗作是《朱日和：钢铁集结》。您曾说过，这是自己比较重要的一首诗。请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，并谈谈它对于您来说为何重要。

刘笑伟：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，2017年7月30日上午，人民解放军在内蒙古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了大阅兵。这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，是人民军队整体性、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。当时看着央视的直播，想起自己作为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采访过的一些重大历史活动，不禁心潮澎湃。特别是看到、听到战机翱翔、战车轰

鸣，地面部队跑步集结时升腾起的尘土折射着金色的阳光，心中的诗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。我用了50行左右的篇幅，对这支军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高度概括，特别是对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具有现场感的速写。这首诗对于我来说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是一道“分水岭”——自此之后，我的诗歌自觉地向新时代军旅诗不断迈进。

黄尚恩：《岁月青铜》处理的是比较“硬”的军事题材，比如宏观的军事场面、先进的军事科技等等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题材比较难以进行诗意的转化。您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，面临了怎样的创作甘苦？

刘笑伟：军旅题材无疑是宏大的，但越是宏大的主题越需要“小”的切入角度，否则就会变成生硬的口号。也就是说，越是历史大事，越需要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。因此，一定要捕捉到并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，同时要折射出整个时代。当下的诗歌创作有些小化倾向，问题就在于有些诗人只写出了自己的个人感受，没有折射出这个时代。

我在创作过程中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辩证处理“大题材”和“小视角”的关系。例如，军改之后，许多部队一夜之间就要移防到千里之外。这个题材如何表达？我在《移防之夜》中，选取了一个最典型的场面——与妻子和孩子告别，选了一个最直观的印象——壁虎断尾。这首诗是这样开头的：“只有今夜，我才感觉身如壁虎/头倒悬着，紧贴着墙壁一角/身材矮小，面对你和孩子的爱/你的泪水流成一条毒蛇/一下咬在了我的尾巴上/我一阵剧痛，尾巴总是要断的——且让它挣扎一会儿”。描写军改的诗本来就不多，这首诗之所以引起一些关注，最关键的还是以“小”见“大”，以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，折射出了“时代之变”。其实，诗歌创作更像是一种冶炼的过程，需要大量的矿石（素材），需要炙热的火焰（激情），需要高超的冶炼技术（技巧），而且要经过不知多少次燃烧，多少道工序，多少回打磨，才能炼出真金。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，有些尝试成功了，有些尝试失败了。这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，只有深夜知道，只有孤灯知道。

黄尚恩：《岁月青铜》中有一些“诗中谈诗”的诗，比如《拆弹手》《不一样的诗》《我的军旅诗》《语言是粮食，诗是酒》等，从多个角度呈现了您的诗歌观。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，您的诗歌观念经历了怎样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？您现在追求怎样的诗歌美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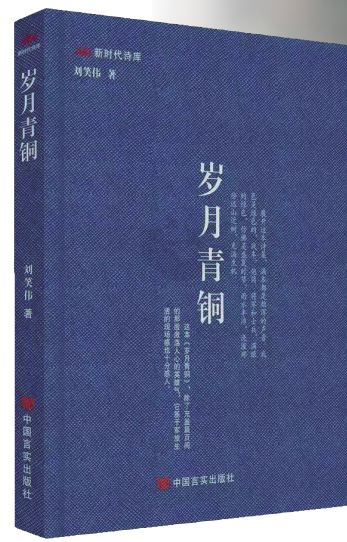
刘笑伟：《不一样的诗》《拆弹手》《我的军旅诗》《茶杯风暴》等诗作，呈现了我对诗歌的认识：诗歌要艺术化地抒写时代的风貌、表达人民的声音。如果说我有“诗歌观”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：就是写出时代中的人和人所处的时代。我觉得，在

诗歌创作中自己始终不变的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，变化的是书写的方式与方法。还有一句很辩证的话：始终不变的就是变化。要想成为大河，必须不断有支流注入。这些年来，古典的、现代的、豪放的、婉约的、中国的、世界的……总之，始终在学习之中，诗歌写作自然也在变化之中。当下，我追求的是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的、雄浑阳刚的、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作品，自然也就崇尚刚健、崇高、壮美的诗歌美学。当然，这些也会发生变化。大河入海之时，就平缓了、平淡了、平实了，但依然隐藏着瑰丽奇崛和惊涛骇浪。

黄尚恩：《在杜甫的怀抱中》一诗中，您借杜甫之口说出：“让大多数人读得懂诗！”实际上，也有一部分诗人认为，诗歌是写给“无限的少数人”的。这是两种不同的读者观。与此相对应，读者对新诗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：一是认为有些诗歌太口语化或者口号化，不算是诗；二是认为有些诗太晦涩难懂，不想去读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如何更好地沟通新诗与读者的关系？

刘笑伟：对于中国诗歌的现状来说，我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反叛：对过于私人化，我说诗歌要书写时代；对于过度西方化，我说诗歌要回归传统；对于学院化倾向，我说诗歌应该让更多的人读懂。事实上，让“多数人”还是“少数人”看，诗作本身是“好懂”还是“晦涩”，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这首诗是不是好诗。这很重要。好诗有通俗易懂的，也有晦涩难懂的。有些好诗的读者群也很小，但并不影响它是一首好诗。我认为，沟通新诗与读者的关系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诗人们真正能写出好的诗歌作品来。而这个“好”，并不是诗人自己说了算，也不是“小圈子”说了算，而应该成为时代、读者和评论家的共识。

黄尚恩：作为当下活跃的军旅诗人，同时也是军事文艺领域的编辑家，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军旅诗歌创作？年轻一代的军旅诗人，在创作中体现出什么样的新特质？



刘笑伟：由于种种原因，当下的军旅诗创作的现状并不十分令人满意，没有出现与新时代要求相匹配的繁荣局面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没有出现影响大、流传广的军旅诗佳作。军旅诗创作队伍也在萎缩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一些军队诗人近年来把军旅诗搁在一边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其他题材的诗歌创作中，真正钟情于军旅诗题材写作的并不多。从读者的阅读评价来看，一些军旅诗作品热衷于喊口号、太直白，大家不愿看；还有一些作品则远离传统、简单模仿西方翻译体的诗作，太晦涩、看不懂。那么，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？我认为，第一要书写“变化”。军旅诗的创作，在和平年代不能局限于对一些浅层现实的描述，更应该是军队的武器装备、人员素质、心理状态等深刻变化的深情抒写。发现和写出“时代之变”，才是新时代军旅诗的真正突破点。第二，要抓住“特质”。军营充实紧张的生活、军人博大的胸怀、令人惊叹的奉献精神、对生与死的独特思考等等，都是军旅诗所独具的巨大魅力。对于军旅诗歌创作而言，如果舍弃生与死的考验、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，而只聚焦个体的自怜自爱；舍弃雄浑和壮阔的意境，而去表现庸常的“一地鸡毛”；舍弃阳刚的、壮美的、雄浑的艺术境界，而一味追求纤细的、柔弱的、甜腻的表达方式……这与其说是一种遗憾，不如说是舍本求末。

一般来讲，诗人处于一个新的时代，就会有新的感受。年轻一代的军旅诗人，其创作一定会呈现出新时代的特质。比如，在整体写作上更加轻松自如，在题材选择上更加自由多样，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多元现代。我对于年轻一代军旅诗人的期望是，他们的诗作既宏大又精致、既古老又现代、既雄壮又柔情，让人阅读后充满新鲜的阅读体验。我相信，通过老中青三代军旅诗人的共同努力，新时代的军旅诗一定能够迎来新的辉煌。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庞余亮：成为那只找到自己的螃蟹

□本报记者 罗建森

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字怎么读？”白天的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，那时我的喉咙里仿佛堵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，紧张、惶恐、心虚。我不想再犯下同样的错误，于是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，素材就这样慢慢多了起来。可以这么说，我笔下的“贤善”和“性灵”不是我给予孩子们的，而是孩子们无意中赐予我的。

记得那时我个子矮，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。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，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，我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，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般转向我的方向。在现实中，很多学生对生活的理解甚至超越了我，做了15年“小先生”，不仅是我教学生，更是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。直到现在，学生们还会打电话跟我聊天，倾诉他们遇到的问题与困惑。他们把我当作兄长，这让我非常欣慰。与孩子们相处，有种无言的默契，相当于在一片森林里，风刮到我身上，也刮到了他们身上。这样的暖风里全是无形的“贤善”和“性灵”。

罗建森：《小先生》中写到了许多孩子们的校园和生活趣事，比如游泳、爬树、“架鸡”、跳绳、踢毽子、溜旱冰，读来总让人会心一笑。但也谈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有些孩子因为贫穷而辍学，有些孩子因为家庭暴力而留下终身残疾，大人们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，以及几位少年的不幸早夭等。可以看出，您并不是要写一部完全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回忆录，没有刻意回避乡村生活中真实存在的“乌云”。在处理这些或欢快或不幸的素材时，您的心境是怎样的？

庞余亮：在很多人看来，乡村教师的生活是简单的，但乡村学校的爱与成长是会发光的。我想通过《小先生》把这15年的光储存起来，把所有发光的萤火虫放在一起，做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。但乡村生活中的“命运感”是非常凸显的，在《小先生》里面，有很多地方我都大量做了减法，有很多留白，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抹去的“乌云”部分，这是乡村生活的暗影。

但生活总在继续，不管快乐或者不幸，孩子们依旧要长大。这就是我无法舍去或者减去那些疼痛素材的原因，正因为有了这些暗影，乡村教育的那盏灯反而更增添了亮度。我期待有更多的有心人，在《小先生》中既能看到灯光，也不忽略那些隐疼的暗影。这才是真实的乡村教育。

罗建森：在散文集《半个父亲在疼》中，您写到了自己与父母在一起时的生活，写到了原生家庭中的一些隐秘的伤痛。当您以“小先生”的身

份站在讲台上时，是否会想起自己的童年？这段“小先生”的经历，是否有让您之后的生活态度或生活观念发生一些转变？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？

庞余亮：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，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48岁。我是父亲的第10个孩子。父母衰老，我大部分时间是独自长大，没人管束我，我的童趣和顽皮一直没有减弱。我做“小先生”是1985年，父亲中风瘫痪是1989年秋天，去世是1994年秋天。这期间有5年时间，我一边做“小先生”，一边和母亲一起照顾瘫痪的父亲。在《小先生》中，我写到过学生家长身上的“乡村暴力的种子”，这种子的背后，是贫穷和生存的压力。其实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种子，准确地说，是我文盲的父亲播种在我身上的。在《半个父亲在疼》中，可以看到这颗种子依然存在于我疼痛的亲骨中。

“乡村暴力的种子”一直没有在我身上生根发芽。这个奇迹的发生，首先要感谢读书，是愈来愈多的好书，让这颗“种子”没有了生长的机缘。我更感谢乡村教师这个职业，在孤独中长大的我特别珍惜童年、童趣和友爱，喜欢用孩子的童年来校准自己的人生，学生们像晨光一样映照着我的教学、阅读和写作，教学生活虽然清苦，但也甘甜。

15年的乡村教师生活给了我一本《小先生》，也给了我一部童话集《银锄子的秘密》。学生们的爱给了我长达15年的黄金时代，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，也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。15年的“小先生”生涯，足够我挖出更多的宝藏。

罗建森：相比一些专业写作者，业余写作似乎更不容易，需要在琐碎日常中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毅力。您为什么选择走上写作这条路？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到今天？

庞余亮：11岁那年，我见到本村有个哥哥有本《青春之歌》，跟他软磨硬泡了3天，他才答应借我看两个月。偏偏这时候，我母亲让我去给家里的猪打猪草，我当时就决定要违背一下母亲，不打猪草了，即使挨打也要把书看完。天下的母亲都是出色的侦察高手，为了防止母亲找到我，我在打谷场上挖了一个草垛，扒开一个小洞，钻进去躲在里面，囤囤吞吞、连蒙带猜，把厚厚的《青春之歌》看完了。看完这本书的结果有三个，一是挨打了，二是全身都是草垛里虫子咬我的斑点，三是我的身体既不疼也不痒，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。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不再是我们村庄的人，一个远方的人。

罗建森：庞老师好！首先恭喜您的《小先生》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类奖项。这本书字数并不多，但其中传递出的温情却相当饱满坚实。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创作这样一本书？作为对15年乡村教师生涯的回顾和总结，这本书对您而言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意义？

庞余亮：非常感谢公正而温暖的评委们，他们用慧眼发现了这本小书。

1985年，师范毕业的我来到江苏兴化的水乡深处，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。当时我18岁，身高1.62米，体重44公斤，长了一副娃娃脸，被学生们和家长们称为“小先生”。我还记得我的第一节课，很害怕“镇”不住学生们，先是惊慌，后来是镇定——拯救了我的，是学生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。作为“小先生”的我，反而从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。

在乡村学校，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。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，但在这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。学生们在老教师面前一点都不活泼，但在我的课堂上，他们总喜欢把积压的调皮和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他们心中，我可能更像一个喜欢读书、喜欢给他们读诗、陪他们踢足球的大哥哥。他们把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、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“送”到我面前。

很多瞬间都是值得回忆的，比如在晨曦中打扫卫生的少年们，他们的影子和树木的影子“绘”在一起；比如学生散会后，我独自站在操场树下，合欢花散发出的香气；比如突然停电的晚自习辅导课，孩子们很安静，而我在黑暗的教室里继续讲课。乡村的黑是最纯正的黑，乡村的静也是最纯正的静，天地间只剩下我的声音。后来电来了，光线在教室里炸裂开来，我突然发现孩子们的头发比停电前更黑更亮了，乌亮乌亮，像是刚刚洗过



一般……故事多了，我决定记下来，记在我的备课笔记后面，就是只写每页的正面，反面空着，留下来速写学生和同事们又一个一个小故事。在上课和记录中，我也在乡村学校完成了我的“第二次成长”。

我不会写教的东西，我最想写的是如何与孩子们拢在一起，带着他们共同成长。所以《小先生》一共写了三方面内容：学生们的成长，老校长、总务主任和老教师们生活工作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奉献，我18岁到33岁的个人成长。我期待《小先生》像那颗在乡村学校冬夜里靠煤油灯慢慢煮熟的鸡蛋，以此献给所有为乡村教育默默奉献的老师们，献给一批批在乡村教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。他们是我精神的背景，也是我人生永远的靠山。

罗建森：《小先生》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，也是一本关于“爱”的书，展现的是“小先生”与孩子们的彼此支持和共同成长。您是怎样确定这本书的创作基调的？

庞余亮：《小先生》出版之后，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继承了“贤善”和“性灵”散文的文心和传统，这是叶圣陶、丰子恺、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。“贤善”和“性灵”的起点应该在我备课的煤油灯下，那时我一边备课，一边记下了《一个生字》，那是学生们的第一个故事。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，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，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，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。我想起白天犯下的错，有个学生问我：“小先生，您想过这个

爱上了读书，也就爱上了写作。虽然在基层写作是相当艰难的事，虽然我们面前是平庸而重复的生活，虽然文学之路是一条比羊肠小道还坎坷的道路，但是文学所拥有的拯救与宽容的力量，远远大于生活的挑战。

我老家兴化是有名的螃蟹之乡。我最早写诗是有笔名的，我姓庞，所以取名叫“螃蟹”，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张扬舞爪了。但螃蟹是值得学习的，每只螃蟹的长大，需要自我蜕变18到21次左右。《小先生》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，第一稿有28万字左右，可以直接出版，但我觉得不满意，继续修改，并在修改中更加理解了文学的辽阔。为了无限接近这种辽阔，我的修改时间变得很漫长，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，《小先生》也从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。实际上，我觉得我每写完一本书，都有螃蟹蜕壳一样的收获。我想成为此生我最想成为的那只螃蟹，通过写作，找到远方的那个自己。

罗建森：您的创作所涉文体广泛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儿童文学，都有出色的表现。您是抱着怎样的想法来进行不同文体的创作的？

庞余亮：我相信“1万小时定律”。寂寞其实不是惩罚，也许是命运的恩赐。1985年8月，我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师范，毕业之前，一位老师告诉我，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，要学会成长，就得逼着自己读书，给自己补上社会学、史学、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，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投向亚洲文学、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。因为我父母均是文盲，家里几乎没有藏书，乡村学校也没有藏书，因此到了乡村学校后，我把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，在阅读中我学会了对我所爱的文学作品进行“拆解”和“组装”。就这样，在15年的漫长寂寞的生活中，我完成了对各种体裁的自我训练，我不想辜负我面前的时间和生活，更不想辜负我热爱的文学。

罗建森：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？

庞余亮：今年我完成了10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长篇散文《小虫子》。这是《小先生》的童年前传，写的是小时候与蜻蜓、天牛、屎壳郎、蚂蚱、蚂蟥等小虫子们为友为敌的我。在与乡村虫子们的拉锯战中，渐渐长大的我体验到了世界的奥秘和生活的百味。这是属于我的《昆虫记》，也是中国孩子的蓬勃成长记。《小虫子》将由出版了《小先生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，期待得到读者们的喜爱。